

学术专论

本土有会馆：清代山西本土会馆研究

张霞

【摘要】既有研究围绕会馆产生的“同乡”“客地”等概念共识并不能完全涵盖现有的会馆类型，以本文整理的17座山西本土会馆为例，可为探讨会馆的概念与类型提供新素材。本土会馆产生于清代，可视为一种以本地商民为主体，在本地本乡创建的具有商务与祭祀功能的社会组织，其有着丰富的内涵与种类，并在与异地会馆的互动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垣曲县同善商贾会馆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商业性、祭祀性、自治性色彩，其140年的兴衰历程为考察本土会馆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提供了案例支撑。本土会馆代表了一种重要的会馆类型，具有较大的发掘空间与较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清代 本土会馆 概念 类型 山西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23)-05-0104-010

从晚清来华传教士调查中国行会制度时涉足会馆算起，中国会馆史的研究已长达130余年，先后经历了从经济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的不同研究取向，涌现出许多优秀成果。何炳棣、王日根、冯筱才、白思奇、王兴文等学者先后进行过相关的学术史梳理，此处不复赘言。^①目前学界对会馆的性质尚存争议，主要有同乡组织（俱乐部）、商业组织、行会组织、社会组织、地方组织、自治组织等不同观点；在类型上，一般按经营主体划分为士人会馆、商人会馆、移民会馆，且均为同乡人士在客地所创建的异地会馆。^②可见，学界对会馆的界定虽存在分歧，但对会馆的同乡性、异地性特征却达成共识，成为不同类型之间进行对话的纽带。然而，围绕“同乡”“客地”等概念共识形成的异地会馆概念却不能完全涵盖现有的会馆类型，如以本地商民为

【收稿日期】2023-03-12

【作者简介】张霞（1986—），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太原030006；xiaranwan@163.com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京津冀地区清代山西会馆与山西商人研究”（17YJC770043）、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大同地区碑铭所见民族融合历史研究”（21@ZH030）阶段性成果。

- ①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引言，第1-3页；王日根：《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评述》，《文史哲》1994年第3期；冯筱才：《中国大陆最近之会馆史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2000年）；白思奇：《地方在中央：晚期帝都内的同乡会馆、空间和权力》，秦兰珺、李新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11页；王兴文：《明清会馆研究的四大论题——基于近百年学界研究的分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2期。
- ② 相关讨论参见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丁长清：《试析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与区别》，《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王日根：《近代工商性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宋钻友：《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兼论政府与同业组织现代化的关系》，《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赵鹏、李刚：《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庙、馆、市”合一新探——以山陕会馆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主体创建的本土会馆。^①

本土会馆在全国各省的分布情况尚无精确统计，以笔者目力所及，山西、河南、江西、广东的部分清代会馆应属于此类。其中，以山西省的此类会馆最为丰富，数量多达 17 座，涉及 13 个县。相较于明代即已形成的各类异地会馆，本土会馆尽管产生时间较晚，数量较少，地域分布不平衡，且自身发展明显受到前者的影响，但却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类型，并扩展了会馆的概念与内涵，而学界对此类会馆尚无系统研究，需引起重视。本文通过现存史料与田野考察中发现的以本地商民为主体在本地创建的山西本土会馆为例，对会馆的概念、类型及其社会影响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推进会馆史的理论性与个案研究。

一、山西本土会馆的类型与特征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群体日渐壮大。同时，山西会馆的分布范围也不断扩展，数量日益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曾多达 550 余座。^②从京师、各省都会、商埠、码头到中小城镇、商业发达的乡村，都有山西会馆的踪影，这其中也包括设立在山西地方州县的本土会馆。

根据对现存史料的爬梳与田野考察的收获，笔者共发现 17 座清代以来的山西本土会馆，依创建时间与分布地域排序，列为表 1。

表 1 清代以降山西本土会馆统计简表

序号	会馆名称	现今馆址	创建时间	创建者	会馆功能
1	高平县石末会馆	高平市石末乡石末村	清代	本地商民	本地乡绅议事、商人洽谈生意、中途休息的主要场所
2	高平县乌绫会馆（丝绸行会）	高平市金峰西路南侧（原裤裆西街）	清代	本县丝绸商	本县丝绸业的行业组织
3	高平县商务会馆	高平市旧城南门外外部家巷与安平巷东南	康熙朝	本县商民	本县商界办公、祭祀场所
4	高平县寺庄会馆（关帝庙）	高平市寺庄镇寺庄村	1854	本镇商民与外地商民	本镇往来商人议事、迎神享赛之所
5	垣曲县同善商贾会馆（关帝庙）	垣曲县同善镇北门外	1780	本镇商民与外地商民	往来商贾歇息、洽谈生意、祭祀拜跪之所
6	芮城县商会会馆（财神庙）	县城内大禹西街	1816	本县商民	本县商会办公场所，商民祀神、集会之地
7	长治县关帝庙会馆（关帝庙）	长治县苏店镇南董村（原长治县南董镇）	道光朝	本镇商民	本镇商民祀神、聚会议事之所
8	浮山县广生会馆	浮山县县城	1823	本县商贾	本县商贾往来会务、修明祀典之所
9	猗氏县牛杜会馆	临猗县牛杜镇	1830	本镇行商居贾	本镇商民享献、聚会、议事之所
10	陵川县礼义会馆	陵川县礼义镇北街村	1835	本镇商众	本镇商人议事、祭祀关帝之所
11	陵川县附城会馆（关帝庙）	陵川县附城镇附城村	1853	本镇商号	本镇商贾集会、奉祀拜跪、议论公事之所

① 如廖声丰、孟伟在论述明清时期山西高平县寺庄村的商业发展时，曾谈及当地的商号参照晋商在外经商的“会馆模式”于 1854 年建成“商人会馆”，进行自治和自理。参见其《明清以来山西村落的庙宇与商业发展——基于对高平市寺庄村现存庙宇碑刻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② 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年，第 438—463 页。

(续表)

序号	会馆名称	现今馆址	创建时间	创建者	会馆功能
12	泽州府梨园会馆（五聚堂）	晋城市城区（原凤台县周元巷路北）	1850年前	泽州府伶业同人	泽州府五县梨园寓所，敬奉神灵、协商行事、联络情谊
13	夏县曹张会馆	夏县曹张镇东街	1873	本镇商户及外来客商	本镇商人祀神、议事、观戏之所
14	永济县梨园会馆（元宗关帝财神庙）	永济市韩阳镇	1887	本县祁彦子与伶业同人	本县伶业办公、祀神之所
15	襄陵县古城会馆（关帝庙）	襄汾县古城镇东街村蔺家巷东	1888	本地商民	商界办公场所，外商住宿、交易活动场地，商界求神保佑、祈望财源茂盛的祀地
16	太原县学会会馆	太原市杏花岭区奶生堂中段路东（原省城麻市街郑家巷一号）	1918	王惠、阎佩礼（太原县人）	供同乡学子投考中等学校免费食宿，平时为闾里乡亲们进城办事时提供方便
17	曲沃县商界会馆	曲沃县县城	1918	本县商人	本县商会办公场所，众商论商情、讲商业、庆祝称觞之地

说明：（1）“会馆名称”均为当地俗称，加括号者为别称；（2）“现今馆址”为会馆现时所处地址，部分拆毁不存者亦记其相应地址，加括号者为当时地址；（3）“创建时间”以会馆竣工时间为准，具体时间不详者记其所在朝代；（4）“创建者”依据史料记载判断，有商号、商民、行业同人、个人之分；（5）“会馆功能”主要指会馆在经营过程中所具有的各种功能，依史料摘录或概括。

资料来源：（1）姬积亮、文战胜主编：《高平市地名志》，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年，第320页。（2）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第413、446页。（3）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第413、446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5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6—27页。（4）常书铭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高平市卷》上册，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659—660页。（5）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第425—432页。（6）张正明等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21—22页；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会馆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7页。（7）贾圪堆主编：《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215页。（8）张金科等主编：《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641页。（9）文红武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临猗县卷》，三晋出版社，2017年，第152页。（10）王立新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235页；晋城市旅游文物局编印：《寻找失落的遗珍》，2012年，第224页。（11）王立新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第264页；张正明等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2009年，第491—493页。（12）刘金锋主编：《晋城文物通览》碑刻卷（上），山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栗守田主编：《上党梆子》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94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晋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晋城文史资料》第3辑戏曲专辑，1995年，第281页。（13）张正明等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第524—525页。（14）王福才主编：《中国戏曲文物志》第3册《戏曲碑刻卷》下，三晋出版社，2016年，第504—505页。（15）刘武经、李安义主编：《古城镇志》，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第379—380页；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第412、446页。（16）薛愈编：《山西藏书家传略》，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4—125页；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太原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5页；吴国荣主编：《太原经济笔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5页。（17）雷涛、孙永和主编：《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曲沃县卷》，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323、327、340页。

由表1可知，上述以本地商民为主体在本土本乡创建的会馆分布较广、历史悠久，创建历程从清康熙朝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从地域上看，上述17座会馆按清代政区涉及7个府及直隶州，^①除太原府位于山西中部外，其余均在南部地区，分别为：平阳府（浮山、襄陵、曲沃3县），绛州直隶州（垣曲县），蒲州府（永济、猗氏2县），解州直隶州（夏县、芮城2县），泽州府（高平、陵川、凤台3县），潞安府（长治县）。这种分布特征与晋南、晋东南繁荣的商业经济相一致，大部分处于山西与陕西、河南、直隶交界的商贸路线上，为本土会馆的兴起提供了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

① 民国初期山西政区出现较大变动，为统一标准，民初的2座会馆亦按清代政区归类。

从时间上看,除2座具体时间不详外,其余15座有着较清晰的创建时间,分别为康熙朝1座(高平县)、乾隆朝1座、嘉庆朝1座、道光朝5座、咸丰朝2座、同治朝1座、光绪朝2座、民初2座。总体上,清代至民国山西本土会馆的发展呈现两头少、中间多的特点。清前期仅有地处晋城盆地北端的高平1座,清中期渐发展至晋豫、晋陕商贸要冲的垣曲、芮城2座;至道光朝以降的晚清时期则是主要的创建阶段,无论是腹地州县还是边界州县均出现大幅增长(共10座),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的道咸时期发展最为迅速;民国时期则出现明显衰落(仅2座),且会馆功能较前出现明显转型。可见,晚清时期在商业发达的城镇与农村集市周围出现的各类新型手工工场,进一步推动了山西市镇经济的发展,^①为本土会馆的兴建提供了经济条件。

从会馆名称上看,表1中17座会馆的命名方式较为多样,但也有相对集中的特征。遵循会馆所在地地名是最普遍的命名方式,共有8座,占比47%,且均为县辖市镇的名称,其中垣曲县同善镇的“同善商贾会馆”除以所在地命名外,还加入了会馆的经营主体“商贾”。以单一性行会组织命名的有3座,占比约18%,分别为丝绸行1座、梨园行2座。以综合性商业组织命名的有3座,占比约18%,分别为“商务会馆”“商会会馆”“商界会馆”。以庙宇命名的有1座,占比约6%,为“长治县关帝庙会馆”。以祈福词汇命名的有1座,为“浮山县广生会馆”。以非盈利的公益组织命名的有1座,占比约6%,为“太原县学界会馆”。可见,山西本土会馆中近半数以所在市镇命名,这是本土会馆区别于异地会馆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当然,以行会组织或商业组织命名者也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上述会馆中亦有6座以“关帝庙”为别名,1座以“财神庙”为别名,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庙馆合一”的特征。^②

从创建者来看,表1中会馆主要由会馆所在地的本土人士捐资建造与经营,这是本土会馆区别于异地会馆的另一突出特征。不过,尽管以本土人士为主,却仍可细分为四种类型。首先,以本地商号及商人为主捐资修建的会馆共有7座,包括高平县乌绫会馆、浮山县广生会馆、猗氏县牛杜会馆、陵川县礼义会馆、附城会馆、夏县曹张会馆、曲沃县商界会馆。其中,部分会馆亦获得在本地居住的外来商人的捐助,如陵川县附城会馆的创建得益于1823—1850年“合镇饷钱”2.4万千文,涉及66家本地商铺(共捐钱2.28万千文)及1位凤台县商人(捐钱12千文);^③还有部分会馆得益于外地客商,如曹张会馆“纠集合镇客户,量力捐资,共得银一千七百有零,外客商施银一百六十余两”。^④其次,以本地商号、商人与四乡村民为主捐建的会馆共有7座,即加入了普通民众的力量,包括高平县石末会馆、商务会馆、寺庄会馆、垣曲县同善商贾会馆、芮城县商会会馆、长治县关帝庙会馆、襄陵县古城会馆。其中,部分会馆也得到了本地营业的外来商户(商号、商人)的捐助,如寺庄会馆在咸丰四年(1854)竣工时统计本地商民总共捐钱290.4千文,其中本土商户(商号、商人)、村民共捐钱191.4千文,外来商户共捐钱99千文(约为总数的34.1%),助力也很大。^⑤再次,本地梨园行同人捐建的会馆共2座,分别为泽州府梨园会馆、永济县梨园会馆。最后,本地个人捐建的会馆仅有太原县学界会馆1座。可见,以本地人士为主要力量在本土本乡建造与经营,是本土会馆的基本特征之一。

从会馆功能来看,本土会馆的创建主要为本地商民集会议事、往来商民洽谈与休息、本地祭祀(演戏)提供场所,故大体上具有处理商务、供应寓所、祭祀神灵三种功能。不过,因各自定位与规模的差异,上表会馆的功能并不完全一致。具体来讲,处理商务的功能最为广泛,

① 刘建生、刘鹏生等:《山西近代经济史1840—194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173—174页。

② 赵鹏、李刚:《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庙、馆、市”合一新探——以山陕会馆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③ 张正明等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第491—493页。

④ 张正明等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第524页。

⑤ 《重修关帝庙碑记》(咸丰四年),现存高平市寺庄镇寺庄村关帝庙。

除太原县学界会馆外，其余 16 座均具备之，其中单一性行会类会馆 3 座、综合性商业类会馆 13 座。^① 祭祀神灵的功能也较为广泛，共有 13 座具备之，且节庆祭祀时多伴有演戏活动，^② 故也兼带娱乐功能。供应寓所的功能较为少见，仅有 5 座具备。其中，三种功能均具备的有 3 座（垣曲县同善商贾会馆、襄陵县古城会馆、泽州府梨园会馆），仅具备商务功能的有 2 座（高平县乌绫会馆、曲沃县商界会馆），仅具备寓所功能的只有太原县学界会馆，不存在仅具备祭祀功能的会馆。上述归类均为笔者依据现存史料做出的概括与判断，不可避免地存在遗漏与不妥之处，有待后面发现新资料进行增补或修正。由上可知，与异地会馆“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功能相比，^③ 本土会馆的商务、寓所、祭祀功能与之大同小异，但因其地处本乡，故没有异地会馆“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的功能，^④ 这是二者功能上最大的不同。

需指出的是，山西本土会馆的创办时间明显晚于国内的异地会馆（最早可追溯到明代永乐年间），^⑤ 而后者在各地的蓬勃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山西地方州县在本土自设会馆的风气。如陵川县附城会馆的《陵邑附城镇创修会馆记》开篇即称：“方今直省内外，以及郡、县、乡、村，会馆之设，有如星罗棋布。懿欤！何其盛也。陵邑西南四十里附城镇者，亦商贾云集之地也，乃列肆已久，而会馆尚缺，不特缓急无纠众之区，亦且朔望无行香之处，非所以明约束、表敬诚也。”^⑥ 可见，当时全国范围内形成的兴建会馆潮流推动了附城会馆的创建。

综上可知，山西本土会馆有着丰富的内涵与多样的类型，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会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概念上，清代本土会馆具有如下三个鲜明特征：坐落于本土本乡（以县域为主），并多以所在地名来命名；^⑦ 本地商民为主要创建力量；主要服务于本地的各类商务与祭祀活动。一些本土寺庙的碑文中虽出现“会馆”一词，但仅为“禅室、馆舍、客房”之意，并不具备上述特征，故不能将之称为本土会馆。^⑧

在类型上，本土会馆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既可以作为综合性的商业组织，也可以作为单一性的行业组织，还可以作为地方民间信仰的祭祀组织与地方基层管理的自治组织。在发展趋势上，清代前中期是山西本土会馆的萌芽阶段，道光、咸丰朝是其兴盛阶段，在同治、光绪朝进入迅速衰落阶段，至民国初年新设的本土会馆则出现明显转型。^⑨ 因此，本文将清代本土会馆视为一种以本地商民为主体在本土本乡创建的具有商务与祭祀功能的社会组织。

二、山西本土会馆的个案分析：垣曲县同善商贾会馆

笔者以资料较为详实的垣曲县同善商贾会馆为例，对本土会馆的创建与发展历程进行个案

① 单一性行会类会馆指由单一行业同人设立与经营的会馆，包括丝绸行业的高平县乌绫会馆、梨园行业的泽州府与永济县梨园会馆。综合性商业类会馆指由本地多种行业共同出资创建与经营的会馆，包括除上述 3 座行会会馆与太原县学界会馆外的 13 座会馆。

② 如夏县曹张会馆“约定每年演戏三台，一以彰神恩之浩荡，一以序客心之和諧”。参见张正明等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第 525 页。

③ 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 年，第 29 页。

④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 19 页。

⑤ 王日根：《中国会馆史》，第 39 页。

⑥ 王立新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第 264 页。

⑦ “本土本乡”包括府域与县域，以县域为主。表 1 的 17 座会馆中有 15 座位于其本县境内；泽州府梨园会馆由府辖五县梨行同人设立于府治所在的风台县；太原县学界会馆则位于与太原县一河之隔的省城内（属阳曲县辖区），因二者地域距离十分接近，且省城亦为太原县人的日常活动范围，故也将之划分为县域内的本土会馆。

⑧ 魏民主编：《三晋石刻大全·太原市杏花岭区卷》，三晋出版社，2012 年，第 36 页。

⑨ 1918 年创建的 2 座会馆在性质上已较前发生明显变化：太原县学界会馆是为新式教育服务的公益组织；曲沃县商界会馆则是新式商业组织——商会的办事机构。

分析。清代垣曲县行政区划变动较大, 顺治、康熙两朝隶属于平阳府, 雍正二年(1724)改隶解州直隶州, 雍正七年改隶绛州直隶州, 直至清末。^① 该县交通便捷, “四通行旅经商”。^② 同善镇地处今垣曲旧县城以北 20 公里处, 位于今运城市垣曲县历山镇同善村, 是当时的一处咽喉要地, 西北有古道可达绛县、翼城县、沁水县, 向西有古道通往夏县、闻喜县, 向南有大道直通黄河渡口东滩, 向东有古道可至河南省怀庆府济源县、河内县, 即使东北方向的山地中也有山路可通晋东南地区。^③ 因此, 同善镇成为清代晋南古道上一个繁荣的商业重镇, 而同善商贾会馆即坐落在该镇北门外。

同善商贾会馆以所在市镇名称来命名, 并加上“商贾”字样, 显示其经营主体与服务对象均为本镇商户, 而现存的会馆碑刻史料也基本支持这一特征。同善商贾会馆曾立碑刻六通, 自乾隆朝延续至民国初年。^④ 这些碑文清晰记录了会馆的发展演变过程, 尤其是碑阴部分还细致罗列了历次兴修中捐款者的姓名及所属地和捐款额等内容。县志等其他资料中尚无该会馆的记载。可见, 会馆碑刻是本文可依据的核心史料。

1791 年《创建关帝庙并舞楼碑记》载“会馆乃商贾翁集之处”, 1840 年《创建卷棚越台碑记》载“商贾会馆之设于乾隆四十五年, 其时先建帝殿, 次及舞楼”, 可知该会馆首创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会馆由该镇商贾共同筹议、募集银钱, 分期分批建成: (1) 乾隆四十五年建成主体建筑——关帝殿与舞楼; (2) 嘉庆二十年(1815)建成卷棚、越台; (3) 道光五年(1825)创建火神祠、廊房; (4) 道光二十年创建财神庙; (5) 咸丰五年(1855)相继建成两庑、茶房、戏房; (6) 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修会馆殿、祠、庙、房、墙、门。^⑤ 可见, 同善商贾会馆的建设, 乃积 1780—1855 年共 75 年之力才全部完成, 其间及其后还有陆续不断的重修工程, 这就需要大量人力与财力进行长期的支持。

通过统计现存碑刻中记载的布施捐资群体与资金规模, 可以简要了解同善商贾会馆历次修建的资金来源与商民捐资状况, 进而考察本地捐资群体在会馆发展历程中的实际作用。具体参见表 2。

由表 2 可知, 本地商民一直是同善商贾会馆历次修建的主体力量, 主导了所有的修建工程与捐资活动。不过, 该会馆时常得到外地客商的资助, 供“商贾栖息”的会馆寓所亦主要为外地客商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少外地客商为方便贸易而在同善镇设立固定商号, 成为本镇铺户中的“外来商号”, 从而成为该会馆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从该会馆所获资金来源中可以彰显, 如 1815 年工程中仅有 4 家洛阳客商施银 12 两(占全部捐资额的 3%), 此后的史料中再无外地客商的捐资记录, 取而代之的则是本地商民中的“外来商号、商人”, 后者在总捐资数量中的比例在 9—22%, 明显高于前者。当然, 即便是本地商民重要组成部分的外来商户(即外来商号、商人), 在该会馆整个发展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远远低于本土商户(即本土商号、商人), 如参与捐修的外来商户数量在历次捐资总家(人)数中的比例分别为 1815 年 9%、1839 年 22%、1855 年 9%、1895 年 21%, 明显低于本土商户所占比例, 其表面上虽呈先升后降再升的“N”型趋势, 但其 1895 年的比例上升主要得益于本土商户数量的锐减, 外来商户的绝对数量在 1839 年后一直处于减少之中。可见, 无论同善商贾会馆如何兴衰起伏, 本土商户始终是会馆创建与经营的主体力量。

① 光绪《垣曲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 61 册, 凤凰出版社, 2005 年, 第 22 页。

② 光绪《垣曲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 61 册, 第 174 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垣曲县委员会编:《垣曲文史资料》第 4 辑, 第 81—83 页。

④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垣曲县委员会编:《垣曲文史资料》第 4 辑, 第 84—86 页; 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 第 425—432 页。

⑤ 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 第 425—432 页。

表 2 垣曲县同善商贾会馆历次修建的资金来源与捐资群体简表

时间	工程规模	功能	本地捐资总况	本地商民					外地客商	资金形式	资金总额
				本土商号	本土商人	本土村社	外来商号	外来商人			
1780	建关帝殿、舞楼	祭祀关帝、聚会议事、演戏	本镇铺户、四乡村民 110 人，捐银 55 两						绛县、阳城、绛州、曲沃、太谷客商	募化施银	银 55 两以上
1815	建卷棚、越台	完善会馆配套设施	本镇商民 196 家（人），捐银 368 两	39 家	35 人	104 人	7 家	11 人	洛阳客商 4 家，捐 12 两	募化施银	银 380 两
1825—1839	建火神祠、东西廊房；重修殿楼	祭祀火神；商贾栖息、洽商之所	本镇铺户 188 家（人）	76 家	71 人		24 家	17 人		“香钱”（每家捐钱 200 文至 23 千文不等）	
1840	建财神庙	祭祀财神、祈福佑财	本镇商贾								
1855	建两庑、茶房、戏房	完善会馆配套设施	本镇铺户 162 家（人）	85 家	69 人		6 家	2 人		施地基一方，来货款 115.978 千文，布施来钱 170.348 千文，香钱 388.69 千文	钱 675.016 千文
1895	全面重修	振兴商业、吸引客户	本镇铺户 28 家（人）	13 家	9 人		2 家	4 人		各行募化钱，社人捐钱，本庙出售柏树钱 57 千文、营积钱 123 千文	
1919	会馆被改为垣曲县第三高小学校校址		舞楼、卷棚作教室，两庑、廊房作教师办公室及学生宿舍								

说明：（1）“时间”所标识的年份为相关工程的施工时间，其中在 1825—1839 年阶段内创建火神祠、廊房的时间为 1825 年，此后断续重修殿楼至 1839 年；（2）“功能”指相关年份所修会馆建筑的具体功能与目的；（3）“本地捐资总况”指会馆所在地商民捐资修建会馆的情况，其中频繁出现的“本镇铺户”为史料所载，包括本土商号商人（本土商户）与外来商号商人（外来商户）；（4）“本地商民”既包括本土的商号、商人与村民，也包括外地（外省、外县）来同善镇经商居住的固定商号与商人；（5）“外地客商”指与同善镇有商务往来的外地商号与商人，并不在本镇居住；（6）“资金总额”指本地与外地商民为会馆捐献资金的总额，其中 1780 年史料未载外地客商捐资额，1825—1839 年与 1895 年史料信息不全，1840 年碑刻字迹模糊难以辨认。

资料来源：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第 425—432 页。

同善商贾会馆在功能上具有鲜明的商务与祀神色彩，并具备供应寓所的能力。该会馆创建的首要目的便是为本镇商贾提供“翁集之处”，后续建设的廊房与两庑也是为往来商贾提供栖息、洽商之所。同善镇各个行业的商人均积极参与了会馆的修建，依据碑刻所载捐资名录，能够判断出的行业即包括典当业、五金行、粮行、药行、皮毛行、裁缝行、杂货行、榨油业、盐业、印染业、旅店业，等等。而且，参与建设的外来商户为同善镇大大拓展了省际、县际之间的商贸往来，仅碑刻名录所涉及的商贸区域即包括省外的河南省（洛阳县、河内、孟津县、济源县、温县）与江西省，以及省内的绛县、绛州、曲沃县、浮山县、太谷县、阳城县、沁水县、凤台县、潞安府等地，商务活动十分繁荣。同时，该会馆相继修建的关帝殿、火神祠、财神庙，一方面是本地商民祭祀神灵、凝聚信仰、求财祈福的祀神之地，另一方面也是团结商民、宣扬诚信、拓展商务的重要场所。如《创建关帝庙并舞楼碑记》显示敬拜关帝是本地商民崇尚“仁信”的表现，“以义求福，固理之可信者”；《创建会馆财神庙碑记》倡导商人修德重诚，“商贾辈各修其德，各矢其诚，则神（财神）之土以兵成而赐福无疆也”；《重修关帝庙与舞楼并创建火神祠及东西廊房合记》则记载火神祠重视“水火相济，阴阳调和”，有助于同善镇商民“四通

八达，生意发财”。^①可见，同善商贾会馆既是关联本地诸多行业的综合性商业组织，也是嵌入本地商民精神生活的祭祀组织，在功能上主要服务于本地的各类商务与祭祀活动。

在管理方式上，同善商贾会馆的创建主要涉及本地商户与本地村社居民两个群体，具体由商户推举的诸位“总理”与村社推举的诸位“首事”负责管理，并且双方主要通过举行会议的方式来推动会馆的资金筹募与经营。山西“村社”作为一种处于国与家之间的地方公共组织，在清代中叶以后已发展成为集祭祀功能与自治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管理组织。^②而自同善商贾会馆创建之始，本地村社便一直参与到会馆的管理活动之中。《创建关帝庙并舞楼碑记》记载，乾隆四十五年本镇铺户与四乡村民 110 人施银 55 两，拉开了会馆的修建序幕；《创建卷棚越台碑记》记载嘉庆十年本镇铺户推举总理 8 名、社中推举首事 22 名，负责推进会馆的增建工作，募化施银 380 两；咸丰七年碑刻记载 1850—1855 年同善镇商贾、社民所推举的总理、首事，继续增建会馆的附属设施，共筹货款、施钱、香钱 675.016 千文；^③《重修建会馆碑记》记载，1892—1895 年该会馆的总理与首事为筹集重修资金，除在本镇各行募钱、出售本庙柏树、使用本庙营积钱外，还有“社人亦釀金助之”。此外，该会馆还设有处理日常事务的住持，经营管理“会产、贡品盛器以及桐花圪崂庄园”。^④可见，同善商贾会馆逐渐发展为融合当地商业事务与村社事务的地方议事机构，成为一种带有基层管理色彩的自治组织，通过会馆的修建、管理与经营来融入本土社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发展趋势上，同善商贾会馆的兴衰起伏较为分明，大致可划为四个阶段，而充当本地商民核心力量的本土商户（本土商号、商人）数量可作为考察会馆变迁的重要参照标准。（1）乾隆、嘉庆朝为初创阶段，本地商民与外地客商均参与其中，两次工程修建了最基础的庙馆设施，募化资金也由初次的银 55 两以上增长至第二次的 380 两，呈现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其中参与会馆创建的本土商户数量出现明显增加，由 1780 年的至多 55 家（人）增加至 1815 年的 74 家（人），^⑤且 1815 年的本土商户远多于外来商户（外来商号、商人），前者是后者的 4.1 倍。^⑥（2）道光、咸丰朝为繁荣阶段，各类重要的配套设施全部完成，且碑刻显示该阶段的工程资金完全来自本地商民，其中参与修建的本土商户数量出现明显增加，1839 年达到 147 家（人），1855 年更增至 154 家（人），且募捐方式呈现“募化施银”“施地基”“捐输”“香钱”“货款”等多样化趋势，其中按月募捐的香钱成为会馆最稳定的资金来源。不过，本地商民中的外来商户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1839 年增长为 41 家（人），1855 年则骤降至 8 家（人），这从侧面反映了该会馆强势的“本土”特性。（3）至光绪朝以后，该会馆进入迅速衰落阶段，这突出表现在参与会馆重修的本土商户急剧减少，1895 年大降至 22 家（人），外来商户也降至 6 家（人）（外来商号仅 2 家），而筹措资金的形式除以往的募化钱、社人捐钱外，还出现了售卖庙产的柏树钱和吃老本的营积钱，这与当时的经济大环境密切相关。（4）民国初年是该会馆的转型与消亡阶段，1919 年在县政府的施政规划中该会馆被改设为垣曲县第三高小学校，成为推广新式教育的场所，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垣曲县委员会编：《垣曲文史资料》第 4 辑，第 85 页。

② 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第 261、281 页。

③ “香钱”本指信徒进香所施的银钱，此处主要指同善商贾会馆以公议的形式要求本镇商户按月分等捐钱，以募修建资金。参见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会馆卷》第 363 页。

④ 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第 426—431 页。

⑤ 1780 年的会馆首创过程中“本镇铺户并四乡村民布施计 110 人”，因具体分类信息缺失无法区分商与民的比例，按 1815 年修建中本土村社 104 人约为本镇铺户 92 家（人）（本土商号 39 家、本土商人 35 人、外来商号 7 家、外来商人 11 人）的 1.13 倍计算，1780 年的本镇铺户约有 52 人（ $110 / (1 + 1.13)$ ），约占总人数的 47%，即使按 50% 计算，也至多为 55 人。参见表 2。

⑥ 1815 年的本土商号 39 家、本土商人 35 人、外来商号 7 家、外来商人 11 人，故本土商户 74 家（人）是外来商户 18 家（人）的 4.1 倍。参见表 2。

舞楼、卷棚改为教室，两庑、廊房改为教师办公室及学生宿舍，至此同善商贾会馆完全转型为教育机构，其传统的商务与祭祀功能也正式消亡。^①需要说明的是，地方政府将会馆改设为政府机关、教育机构等公共空间，是民国时期时常发生的一种现象，代表了部分会馆转型的趋势，而山西本土会馆同样面临此类问题。^②

综上所述，作为一座典型的本土会馆，同善商贾会馆坐落于同名的垣曲县同善镇，由本地商民为主体力量创建并经营，是一种具有鲜明商业性、祭祀性、自治性色彩的社会组织，主要服务于本地诸多行业的商务与祭祀活动。该会馆 140 年的兴衰历程，为考察本土会馆的概念、类型与阶段性发展特征提供了案例支撑，也为会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

三、结语

以本文统计的 17 座山西本土会馆为例可知，本土会馆有着丰富的内涵与种类，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会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概念上，本土会馆具有如下三个鲜明特征：坐落于本土本乡（以县域为主），并多以所在地名称命名；本地商民为主要创建力量；主要服务于本地的各类商务与祭祀活动。在类型上，本土会馆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既可作为综合性的商业组织，也可作为单一性的行业组织，还可作为地方民间信仰的祭祀组织与地方基层管理的自治组织。在发展趋势上，清代前中期是本土会馆的萌芽阶段，道光、咸丰朝为兴盛阶段，同治、光绪朝进入衰落阶段，至民国初年则出现明显转型。因此，本土会馆主要形成于清代，是以本地商民为主体在本土本乡设立的具有商务与祭祀功能的社会组织。

通过对垣曲县同善商贾会馆的个案分析可知，自 1780 年该会馆初创后，以“本土商户”为核心的本地商民始终是会馆创建与经营的主体力量，主导了所有的修建工程与捐资活动。在功能上，该会馆既是关联本地诸多行业的综合性商业组织，也是嵌入本地商民精神生活的祭祀组织，还是一种带有基层管理色彩的自治组织。1919 年该会馆改设为教育机构，则代表了民国时期部分本土会馆的转型趋势。

其他省份亦分布着一定数量的本土会馆，但限于史料，尚无法精确统计全国数量，此处仅举代表性案例予以说明。广东省佛山市独具特色的冶铁业受到其他行业创设会馆的影响，于乾隆十五年“计炒炉四十余所，始鉴谋会馆之建”，主要功能为“恭奉四圣香火，用邀福于神，以佑人和”，并立《鼎建佛山炒铁行会馆碑记》以铭之。^③在“四大怀药”产地的河南省怀庆府，该地“怀帮”药商前后集资银 5 万余两，自乾隆五十二年至道光五年建成“药业会馆”（药王庙），从而“以迓神庥，春秋禋祀，瞻拜有地，庶几克慰众愿”。^④江西抚州府属六县（临川、金溪、东乡、崇仁、宜黄、乐安）商人于光绪年间集资重建“玉隆万寿宫”作为“抚州会馆”，最初服务于六县来抚州经商的商人及赴考的童生，此后逐渐发展为“行帮、社会集会、结社的活动场所”。^⑤

无论是北方地区还是南方地区均有本土会馆存在。这种以本地商民为主体在本土创建的会馆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异地会馆，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类型，这对丰富学界现有的会馆概念与类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本土会馆突破了既往研究局限于“同乡”“客地”的概念框架，将研究视角扩展至会馆创建者的家乡地区，并将会馆所在地的本土商户与外来商户统合起来研究，从而拓宽了会馆史的研究范畴。其次，本土会馆弥补了会馆史研究中存在的地域链条漏洞，增

① 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第 431 页。

② 参见张霞：《清末民初山西会馆文化意义再探讨》，《社会科学论坛》2021 年第 1 期。

③ 广东省佛山市博物馆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75—76 页。

④ 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32—233 页。

⑤ 江西省工商业联合会等编：《江西商会（会馆）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 页。

加了一种重要的会馆类型，有助于在空间上推动全地域的会馆史研究：本土会馆（府域、县域内）——异地会馆（本省异地、外省异地、外国异地），进而与经营主体上的士人会馆、商人会馆、移民会馆实现立体化的交叉研究，这或许就能回答何炳棣先生 1966 年提出的问题：“究竟会馆的地理分布普遍到什么程度？”^①最后，本土会馆自身的多样类型及其演变，有助于为学界研究会馆的性质与转型问题，尤其是商人会馆的内部群体结构与阶段性变迁，提供案例支撑。

References

- Ho Ping-ti. *Zhongguo huiguan shilun* (Chinese Regional Associations). Taipei: Taiwan xuesheng shuju, 1966.
- Liao Shengfeng, Meng Wei. “mingqing yilai shanxi cunluo de miaoyu yu shangye fazhan: jiyu dui gaopingshi sizhuangcun xiancun miaoyu beike de kaocha” (Shangxi Village Temples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since Ming and qing Era Investigation on the Existing Temple Inscriptions of Gaoping Village) . *Zhongguo shehui jingjishi yanjiu*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2(2015).
- Wang Rigen. *Zhongguo huiguan shi* (History of Chinese Guild Halls). Shanghai: Dongfa chubans zhongxin, 2007.
- Zhao Peng, Li Gang. “Mingqing shiqi gongshang huiguan miaoguanshi heyi xintan= yi shanshanhuiguan weili”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of the Industrial and merchant guild hall as a combination of the “temple”“hotel”and “market”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y:An exemplification of the guild halls in Shaanxi and Shanxi). *Shanxi shifan daxue xuebao*(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2014).

A Study of Hometown Guild Halls in Shanxi in Qing Dynasty

ZHANG Xi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xiaranwan@163.com)

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fellow townspeople” and “guest places” cannot fully cover the existing types of guild halls. Taking seventeen hometown guild halls in Shanxi Province as examples, this paper can provide new materials for discussing the concept and types of guild halls. Originating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hometown guild hall can be regarded as a social organization with commercial and sacrificial functions created in the hometown with local merchants as the main body. This institution has rich connotations and types and formed its own uniqu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other guild halls. The Yuanqu Tongshan merchant guild hall had distinct native, commercial, sacrificial, autonomous features, and the one hundred-forty year history of its rise and fall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ometown guild hall characteristics in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us, the hometown guild hall represented an important type of guild hall, which has large exploration space and high academic value.

Keywords: Qing Dynasty, hometown guild, concept, type, Shanxi

①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引言第 2 页。